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5.01.009

“新财经”改革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路径与实践进展

付宏^a, 邬昶俊^a, 汪金伟^b

(湖北经济学院 a. 经济与贸易学院; b. 低碳经济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我国的高等财经专业经历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演进过程。从传统科举制度下的商业专门教育到民国时期满足实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商科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后服务于计划经济发展需要的财经专业教育,到改革开放后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经营专业教育,再到进入新时代后为满足高质量发展的“新财经”专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提出“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新时代中国高等财经专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新财经”改革的理念应运而生。结合财经专业的发展历史与当前部分高校在“新财经”改革方面的实践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培养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财经人才为目标,不断推进财经专业的理念变革、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内涵变革。

关键词:财经专业;“新财经”改革;商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5)01-0117-12

一、财经专业建设的演进史

中国的财经专业建设经历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演进过程。从传统科举制度下的商业专门教育到民国时期满足实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商科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后服务于计划经济发展需要的财经专业教育,到改革开放后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经营专业教育,再到进入新时代后为满足高质量发展的“新财经”专业教育。国外财经专业自18世纪产业革命后开始兴起,后经过现代商科教育的发展,形成以全球化为趋势的发展特征。

(一)国内财经专业的演进史

1. 传统科举制度下商业专门教育的形成与发展(1840—1900年)

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的末位,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内,考试的内容主要侧重于经史子集的考核,强调对儒家经典文献和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商业知识难以进入正統的士大夫教育体系。中国传统的商业知识教育主要依靠社会教育,其内容更多地是对商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依靠的纽带或是家庭,或是专门的商业行会,主要的形式是学徒教育制。

收稿日期:2024-12-1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加快推动湖北‘双碳’财经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2023GB044)

作者简介:付宏(1979—),男,湖北大悟人,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邬昶俊(1989—),男,湖北宜昌人,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汪金伟(1989—),男,湖北黄冈人,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低碳经济学。

传统的士大夫社会,有“商之子恒为商”的身份继承制。同时,在商业的形式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商品的类型以土特产为主、贸易的规模较小的时期,商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承主要以家庭教育为基本单元,由家庭里的父兄长辈直接传授给后辈,教育的内容涵盖了判断商品价格变化、以物易物的准则、特产的地区分布等。自宋朝开始,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盛,制度化的同业组织“行会”产生,促使商业教育由家庭内部教育发展为行会内部的学徒教育^[1]。

学徒教育的教学内容从最基本的生活杂物处理开始,要求学徒学会“扫洒应对之理”,同时注重培养学徒的职业道德素养。在此基础上,教会学徒掌握商业基本技能,类似于通识教育,主要教授学徒掌握从商的基本技能。最后是具体行业专业技能的培养,针对不同行业的商业内容与商品特征,进行专门化的培养,如票号、钱庄,主要教育学徒如何辨别银钱成色,掌握票据记录所使用的“暗语”、符号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相继失利,使清政府认识到自身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逐渐成为主流,并由此掀起一场学习西方各种学科知识的热潮。1862年8月,在奕訢等人的倡议下,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教育萌芽的标志。1867年,京师同文馆开始设立“富国策”课程,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由官方设立的商科课程。随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先后创办了各式洋务学堂,在传统“四书”“五经”的教学基础上,大量增加“西学”和“西艺”的教学内容。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2]。因此洋务派创办的各式洋务学堂皆以实用为办学宗旨,均开设专门服务于商业发展的课程,特别是1891年由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方言商务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的商业学校。在方言商务学堂的基础上,张之洞又于1893年创办了自强学堂,将方言商务学堂归入其中,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行创办并管理的新式商业学堂^[3]。这一系列关于商科教育的新发展、新内容标志着商科教育成为当时官方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官方开始设立包括商业知识、经济知识在内的西方各学科课程,传统科举考试与新教育在知识体系、教育内容、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不论洋务派还是改良派都对传统科举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诉求。李鸿章主张通过开设“洋务”科,把西学引入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为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郑观应,更是认为“不废时文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真正化解民族危机,必须开展更深层次的改革。废除“八股取士”制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5]。

1898年,严修和张之洞分别表达了改革科举的必要,提出在科举考试科目中增加关于经济的内容。光绪采纳维新派人士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的奏议,于1898年6月23日改科举试为试策论。并于同年7月23日设经济特科,其考试内容“分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6]。

经济特科的设立对学堂的课程设置、课程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新式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建立之初便开设商学科。其中,京师大学堂的普通学科为必修课程,共计十科。专门学科为专业类课程,要求每名学生任选其中一到两门学习,其中便包含商学^[7]。另外,成立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大学商科专业毕业生。

2. “癸卯学制”下高等商科教育的兴起(1901—1911年)

为维系自身的统治,清政府于1901宣布实行“新政”。新政下的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洋留学是其主要内容。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等学校管理制度,但最终未能付诸实施^[8]。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实施“癸卯学制”,高等商科教育正式成

为中国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

“癸卯学制”对中国近代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制度安排。纵向上,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六个级别,包含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全过程。横向上,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块。其中,商科教育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始末。初等教育的高等小学阶段,在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中有专门的商科教育,同时还有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讲授商科专业的知识;中等教育阶段,在中等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与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亦包含商科课程的学习;在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也包含有专门商科专业和课程教学。由此可见,专门的商科教育贯穿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

各阶段的商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明显的区分,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商业人才需求。其中,高等商科教育分为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目的在于培养高级商业管理人才,其教育内容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本国和外国的专业商业知识,还要了解各种法律法规及具体行业的基础知识。其中预科学制为1年,本科学制为3年。

另外,在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中,同样对商科教育作了专门的安排。仅以高等教育为例,普通教育中,大学预科分为三类学科,商业为第一类。本科教育中设商科,课程分为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学制为三年。师范教育中,实业教员讲习所设商业教员讲习所,以初、中、高级商业学堂专任教师为培养目标。

据清政府统计,到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27所、各种实业学堂254所、师范学堂514所^[9]。其中在商科教育方面具备代表性质的学校包括:于1901年合并京师同文馆后重建的京师大学堂,设商科,后改为法科下的经济学门与商业学门;由晚清商务大臣盛宣怀于1903年创办的上海高等商务学堂;实业教育中的直隶高等商业学堂、南洋高等商业学堂、明德学堂中的商业专科等;教会兴办的东吴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大学等综合大学,以西方教育体系为基础,均设商科、商学院或工商管理学院等商科教育内容。

3. 民国时期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1912—1937年)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辛亥革命的大幕。孙中山在继承并发扬发展民族商业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振兴中国商业的口号。他指出,“商者,一国富强之所关”^[10],认为“国政”与“商政”同等重要^[11]。

民国时期的商业形式与规模均较晚清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对于商业专业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为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需要,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更偏向于“实用”化。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从清末民初教育仍以“形而上”为办学理念的弊端入手,提出实用主义教育观。1914年,全国商联合会成立,提出“振兴商学”并“筹办和推广高等、中等和初等商业学校及商业补习学校”^[12]。

1912年10月24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3年1月1日公布《大学规程》,将清末形成的“癸卯学制”改为“壬子癸丑学制”,对普通高等教育进行改革^[13]。商科内容较“癸卯学制”更加丰富,涉及范围更广。

“壬子癸丑学制”仍将大学分为预科与本科两个阶段。其中,预科分为文科、法科、商科三部分,“为志愿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设立……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13]本科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其中,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个专业,专业数量较“癸卯学制”增加了3个,并在法科下设经济学门,偏重理论研究。

1912年12月6日,随着《商业专门学校规程》的颁布,清末的高等实业学堂被改设为专门学校,并对商科专科教育进行了安排。提出商业专门学校应“以养成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商业专门学校修学年限为3年,

同样下设1年预科学习,并在修满3年学制基础上,上设1年研究科学习。

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提出学制修改案,主张学习美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推行“壬戌学制”。区别于“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取消了“癸卯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中关于预科的设置,在大学中开展“选科制”,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学科、专业和课程。在大学和专门学校之上设置大学院,即研究生教育。同时注重开展职业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设专门学校,学制为3~5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的教育开始实施大学区改革。大学区改革本质上是在教育中推行“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但与国民党施行的“训政党治”教育理念相违背,仅仅实行两年即被废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长期实行的教育制度,遵循的文件为1928年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的《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将高等教育区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个序列^[14]。

“戊辰学制”是对北洋政府推行的“壬戌学制”进行的局部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的局势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更加注重加强职业教育与提升教育质量。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办学数量、办学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商科教育尤为明显。例如,1918年成立的暨南大学,下设理、文、法三个院系、九个专业。其中商科专业有会计银行、国外贸易、工商管理。到1937年,该校1698名专科和1504名本科毕业生中,商科毕业生人数分别达到575和459人,占全部毕业生人数的比重均超过1/3^[15]。1917年成立的上海商学院,原为郭秉文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后与国立暨南学校在上海合并为上海商科大学,再于1928年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其下设的商学院。1932年从中央大学分出,直接由教育部管辖并最终更名为上海商学院,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独立商科专门学校。其以就业质量高与就业率高闻名,毕业生多从事于金融业或进入政府经济部门,1935年全校共有73名毕业生,全部就业。

民国时期各类院校在商科专业的建设中都呈现出更侧重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点,专业设置多以会计、银行、工商管理、财政等应用型专业为主,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向近代型商业经济转变的时代特点相匹配。特别是“一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对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商业经营与管理人才的需求旺盛,促进各类高等院校加办、增办、扩办其商科专业。

4. 服务于计划经济发展需要的财经专业教育(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并且确立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与之对应,1949年以后,商科教育转向财经专业教育,目的是培养计划经济管理干部。教育模式上,在接收和改造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沿袭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模式,实施“为工农开门”的高等教育方针。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建立人民文化方面,要以苏联创造的新文化为范例^[16]。1952—1953年,在完成对接收的民国教育资源的改造后,教育部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财经专业主要由综合大学和专门的财经院校开设。调整的主要内容充分参照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开设的专业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供销合作社、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业经济、统计、会计、财政、货币与信贷、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工厂管理、铁道经济和劳动经济^[17]。

1957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的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经专业的内容随之得到调整,由原先的14个专业整合为9个^①。1963年,由原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共同修订《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将财经专业由9个增加至10个^②。

同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目标,为大力促进工业发展的需要,在高等教育改革中也体现了更注重工业的内容。比如,195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对民国时期留下来的高校进行全面的拆分调整。调整结果为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

所,工学院由28所增至38所。到1957年,在全国高校的专业结构中,工科类占比达到37%,文、商、政法、财经等专业仅占9.6%。财经院校也由1951年的19所降到1953年的6所,到1954年进一步减少到5所。

5. 由为计划所需向为市场所需转变的经管专业教育(1979—199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再次回到发展经济上来,高等教育改革也同时期展开。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新的财经人才需求,即需要更多样化的财经专业人才。人才培养目标不再仅仅是为发展计划经济培养计划管理干部,同时还包括满足发展商品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

到1982年,全国财经院校已经达到36所,还有27所综合大学开设了财经专业。教育部也不再对各高校财经专业的设置进行“计划式”的管理,各高校开始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基础进行财经专业的建设工作。此时,各高校开设的财经专业主要包括经济学或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或国民经济管理、工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商业经济管理、基本建设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商品学、旅游管理、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财政学、金融学或国际金融、会计学或财务会计、统计学或计划统计等。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促进了财经专业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发展,财经类教育规模增长明显,各院校开设的财经专业种类高达99种。但也带来了盲目开设、专业间界限模糊、专业名称混乱、重复开设等问题。因此,在1987年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将财经专业缩减为48种,占总专业数的比重由1980年的5.2%上升至6.8%,同时将财经专业分为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类^[18]。

6.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经管专业教育(1992—201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原国家教委于1993年公布了新一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确立经济学门类,下设经济学与工商管理两个二级学科。同时,在专业内容上也作了一定的修改,删除了部分为发展计划经济专门设置的专业,新设人力资源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等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专业,专业数量由原有的48个减少至31个。

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时,全球经济发展也开始经历新的科技革命,新兴经济业态、新的经济领域不断涌现。这就要求高校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够紧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人才。1998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确立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并行的两大门类,将工商管理专业改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并缩减为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旅游管理6个专业。在专业课程设计、教材使用等方面主要以引入西方管理理论、使用或模仿西方教材为主。

7. 新时代经管专业教育的“新”发展(2013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再是“基础性作用”,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深层次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向高质量迈进的新阶段。经管专业教育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01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提出推进新工科的建设和发展。2018年,建设并发展“新理科”“新医科”“新文科”又相继被提出。随后,西南财经大学围绕新文科建设,提出“建设新文科、引领新财经”战略。2019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河北经贸大学签署“新财经”本科教育实验基地合作协议,建设新文科背景下的“新财经”改革由此开始。

相比于“旧财经”，“新财经”首先强调的是立德树人，培养的是“有德”的财经人才，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新财经”是面向新时代、中国化的财经教育。因此“新财经”培养的人才还应具有家国情怀，全面认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认识自身将要涉足的行业，具有强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感。其次，“新财经”强调人才的综合素质，除了具备扎实的财经知识技术，还应了解和掌握多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跨学科思维。因此，“新财经”教育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的是高素质复合型财经人才。最后，“新财经”的人才培养是为了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强调实践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因此，在“新财经”教育体系中，实践和实验教学内容相比于“旧财经”教育体系而言，占有更大的比重。

（二）国外财经专业的演进史

1. 商科的兴起

始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带来了以机器为主要驱动的技术革命，工业生产替代传统的手工业作坊，市场上的商品类型、商业模式、贸易规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面对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变化，产业工人和工业管理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需要，因此国外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观开始兴起，大量应用类学科与课程被相继开发出来，建设专门的商科院校的设想逐渐受到重视。1759年，葡萄牙在里斯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商业学校，主要教授商业和国际贸易知识，学习课程主要有算术代数与几何、保险实务、会计方法等。1826年，伦敦大学开始设立专门的商科课程，主要是加强学生对商业知识的掌握。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在高等财经教育领域，以财富生产分析为核心目标的理论学习模式逐渐确立，旨在培养发展商品经济所需的商业人才。

2. 现代商科教育的发展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电力、交通运输等新兴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转向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带来了对财经人才需求的变革，由偏好低技能体能型劳动人才转向偏好具有科学素养的知识密集型人才，科学技术的专业教育、科学技术学科的应用化教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国外财经教育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以主观价值理论为主体，研究人的心理因素的相关管理学科开始兴起。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881年成立，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商学院。随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高校相继成立了专门从事商科教育的商学院。

随着专业化商科教育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商科或工商管理学科的本质。虽然商科教育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满足工业和商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学生选择商科专业往往也是出于对职业前景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但一些学者提出，商科教育还应服务于公共利益。例如，马歇尔指出，如果商科教育的专业态度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态度”，那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确保金钱至上的思维不会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19]。由于商科教育的专业性特征，以及实用主义的盛行，其理论和学术水平严重不足，1916年，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在美国成立，并于1926年制定了全国性的管理类专业课程设置标准。学科标准体系的确立，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商科教育正式形成。

3.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外商科教育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这一转型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产业组织和商业文明的价值体系。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和人才需求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商科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新兴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领域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国外高校的财经教育积极适应数智技术发展新动态，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依托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整合，推动学生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智能教育也被广泛应用到日常教学环节，不断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力，共同塑造育人为本、富于效率、充满活力的数字教育新形态。

此外，终身学习的人才培养改革实践也受到重视。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完善全民终身学习

推进机制,是当前国外财经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这种方式,高校财经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培养出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激发更具有活力的人力资源。

二、“新财经”改革的根本思想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财经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文科建设为新时代财经教育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同时,“新财经”改革是国内财经高校在新文科建设框架下进行的重要实践,体现了新文科建设理念的核心价值。

(一)“两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总书记将之高度概括为“两个大局”,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为“新财经”改革提供了战略指引。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思维和经营模式的根本性影响,以及创新性科技产业的催生,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都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当前经济社会的数智化发展背景下,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兴科技企业的创造性发展,要求加快构建“互联网+高等教育”和“智能+高等教育”的新教育形态。

“新财经”改革,探索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新财经人才教育体系^[20]。这一改革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包括新时代呼吁新育人模式、国家战略需要“新财经”教育改革、“四新”建设召唤“新财经”教育改革、社会发展需要“新财经”教育改革以及专业知识体系优化需要“新财经”教育改革。

遵循“两个大局”思想,“新财经”改革不仅是对传统财经学科教育理念、学科架构与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还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学科知识体系的迭代与升级^[21],保障财经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够顺应技术革新浪潮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专业动态演进的新趋势。

(二)“四新”建设理念的提出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提出“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2]。同时,总书记还将“四新”建设与学科专业优化、创新能力提高、产学研用融合、时代新人培养紧密联系起来。“四新”建设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新工科的建设以“复旦共识”为起点,随着“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在全国范围得到实践。随后,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行动相继推出。201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强调以“四新”建设引领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

提出“四新”建设理念的初衷在于变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在于专业建设。旨在通过建设与发展“四新”专业,提升国家“四力”,即通过建设与发展新工科以增强国家硬实力、通过建设与发展新文科以增强文化软实力、通过建设与发展新农科以增强生态成长力、通过建设与发展新医科以增强全民健康力。

新文科的建设理念注重传统文科专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专业深度融合。通过新文科建设重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用“中国话说中国故事”的理论范式;同时,强调对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的吸收,深入探讨有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问题。

三、“新财经”改革的高校实践

部属高校,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以及地方高校,如河北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都在“新财经”改革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

索包括调整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跨学科合作等方面。这些实践案例不仅展现了“新财经”教育的多样性和实践性,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经验参考。

(一)部属高校的“新财经”改革实践

西南财经大学是国内最早提出“新财经”改革目标的高校,在开展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推进教学数智化发展等方面为国内其他高校提供了丰富且实用的经验。其一,围绕“大数据”“数字化”“智能化”等当前智能时代发展的特点,西南财经大学通过开设“微专业”的方式,建设了一批跨专业、跨院系的“新”专业。例如,西南财经大学与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在国内首次尝试在本科阶段开展“金融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联合培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在硕士阶段,进行“金融科技”硕士的联合培养。同时,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课程在课程结构中的比重,并在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实践教学等领域大力开展数字化建设。其二,在师资力量的培育方面,加强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强化传统教学与新型智能教学的深度融合。例如,围绕教育教育的智能数字化改革,西南财经大学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式、场景式的教学改革内容;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教学环节引入任务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内容;加大数字技术类和数字经济类教师的引进,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并通过柔性引才的形式,引进一批政府和企业界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专家型人才。

随着新文科建设目标的提出,除西南财经大学外,国内传统财经院校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围绕自身专业建设的改革内容,并提出具有新财经建设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中央财经大学提出要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对中国国情深度了解,兼具专业知识和经济金融文化等通识基础的新财经人才。上海财经大学围绕理工与经管专业交叉融合开设了系列实验班,诸如信息管理与金融实验班、数学与金融实验班、交叉科学实验班、财经数学实验班等,加强其数字经济复合型财经人才的培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以自身“财经+政法”共同发展的优势,提出培养创新型和开放式的财经与政法融通人才。对外经贸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外贸财经类大学,立足开放办学理念,以构建“开放型经济学科群为引领的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以国际化和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东北财经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传统财经院校,以“新经管”建设作为其改革内容,立足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发展优势,突出校政企合作,形成“产学合作、专创融合、师生共创”的创新创业实践育人模式。

(二)地方高校的“新财经”改革实践

河北经贸大学是国内较早提出并开展“新财经”改革的地方高校,自2019年9月开始,河北经贸大学以各类实验班为“新财经”改革载体,对其专业结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截至2021年河北经贸大学获批“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两个新专业,河北经贸大学依托已有的优势专业,先后开办了“人工智能法学”“金融科技”“智慧工商管理”“数字财会”“数字经济”“智慧物流管理”6个实验班。为保障实验班发展,河北经贸大学制定了完善的制度保障、经费保障和师资保障体系。例如,实验班常态化发展后为每个班级每学年提供5万元配套绩效经费,开展“全程导师制”,对学生在科研、实习实践、学科竞赛等领域进行专门指导。突出“干中学”,强调成果转化,鼓励专任教师将“新财经”改革思考的内容形成研究成果。截至2024年,知网可检索的“新财经”改革文章中,河北经贸大学教师发表的论文数占比达55.79%。在学生实践教学环节,注重校企合作,特别强调人才供需结构的精准匹配,从具体专业出发对接相关企业,建立专业实习基地,加强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要的适配度。

北京工商大学以“个性化”人才创新培养模式改革为主要内容,通过打造商科智慧教育一体化平台,构建了“个性需求、能力导向、学习驱动”的商科人才培养模式。

合肥工业大学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经营决策各方面的影响,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引进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通过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培养目标—教学过程—质量提升”三

位一体教学体系,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山东财经大学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 推动大数据管理与工程、低碳经济与管理、乡村振兴学等新财经特色学科品牌的建设。学校通过学科交叉赋能“新财经”教育教学改革, 以新技术学科与财经学科相结合, 实现传统财经专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此外, 学校实施拔尖人才分层培养模式, 构建起“院级实验班—校级实验班—荣誉学院实验班”拔尖人才分层培养体系, 并为拔尖人才单独制订个性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还拓展校企合作培养模式, 与多家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合作开办多个校企合作专业, 并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新需求。

广东财经大学以产教融合为特色, 纵深推进教学改革, 锻造新商科产教融合新优势。通过充分利用其国家级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其他优质实验教学资源, 加强实验实践教学改革, 打造实验实践教学新生态。同时, 学校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孪生技术, 推进产教融合教学改革。

四、“新财经”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 理念变革

理念变革是“新财经”改革的先导, 涉及对财经教育的导向、目的、方法等方面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时代的高校财经教育需要与时俱进, 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1. 确立创新导向

创新是新时代财经人才的必备素质, 也是高校财经教育的重要目标。因此, 高校应树立创新教育理念, 鼓励学生和教师挑战传统观念, 培养创新思维 and 创新能力。首先, 加强教育教学活动中创新氛围的营造, 打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为学生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间和机会, 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其次, 注重创新实践活动的开展。通过开设创新实验课程、组织创新竞赛等方式, 引导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 以赛促育,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最后, 完善创新教育的评价。建立科学的创新教育评价体系, 将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鼓励学生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2. 关注社会需求

高校财经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中国财经教育的演进历史, 不论是专业设置的变化, 还是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 都呼应了蕴藏在其背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必须紧密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首先, 要加强调查研究在推进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例如, 定期开展市场调研, 了解社会对财经人才的需求变化和发展趋势, 为专业设置和课程调整提供依据。其次,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 确保教育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最后,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方式,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3. 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理念变革的核心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同时, 在新财经专业育人育才过程中, 要注重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 培养他们的诚信品质和敬业精神。

4. 培养国际视野理念

虽然当前受各种因素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所放缓, 但长期来看, 全球化依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 深层次、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对财经专业教育的国际化内容提出

了新的要求。因此,高校应培养国际视野理念,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和师生交流互访。首先,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引进国际知名高校和机构的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本校财经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其次,推动中外合作办学。与国外高校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财经人才。最后,加强师生交流互访。鼓励师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交流等活动,提升其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是“新财经”改革的重要支撑和驱动力,涉及教育技术的创新、应用和发展。新时代高校财经教育需要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

1. 教育技术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技术也在不断创新。高校应积极推动教育技术创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首先,深层次推动在线教育资源的培育。利用网络技术,开展在线教育,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其次,引入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概念和复杂问题。高校可以引入虚拟现实技术,建设虚拟实验室、模拟场景等,提升教学效果。最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提供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开发智能教学系统、智能辅导系统等,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学习支持和辅导。

2. 教育技术应用

教育技术应用是技术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应积极推广和应用教育技术,丰富教学形式,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建设数字化教育资源库,不仅可以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另外,推广多媒体教学,将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形式有机结合,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加强在线教育平台建设,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在线课程和学习支持服务,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3. 教育技术发展

教育技术发展是技术变革的长期任务之一。高校应关注教育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推动教育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自研+合作”的方式,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技术手段和方法,促进新的教育技术成果的应用。同时,有条件的高校应加强教育技术人才的培养,通过培养既懂教育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

(三)组织变革

组织变革是“新财经”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涉及高校内部管理结构、协调机制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优化和调整。新时代高校财经教育需要通过组织变革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提升教育质量。

1. 优化内部管理结构

高校内部管理结构的优化是组织变革的首要任务。通过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可以降低管理重心,提高管理效率,激发基层活力。国内高校普遍面临管理机构冗余的情况,可通过合并、撤销等方式,精简管理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和职能交叉,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下放管理权限,赋予学院和系部更多的自主权,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让基层教育教学单位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激发基层活力。

2. 构建协同机制

协同机制的构建是组织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构建协同机制,可以加强校内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新格局。首先,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促进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其次,加强院校、院系间的合作交流。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最后,积极构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强与企业、行业、社会的联系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组织变革的重要保障之一。首先,通过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对于海内外知名学者、行业专家、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其加入学校教师队伍。其次,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不断更新知识和提升能力。最后,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教师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贡献学校发展。

(四)内涵变革

内涵变革是“新财经”改革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对原有财经教育模式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以信息化和数字化实现财经专业转型升级,更深层次开展国际化合作,显著提升财经专业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财经人才。

1. 以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专业内容

学科交叉融合强调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23]。其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传统财经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环境科学等相关理工类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二是不同财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2. 以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变革创建智慧教育模式

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变革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24]。其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如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等;二是智能化教学辅助工具的应用,如智能教学系统、在线学习平台等;三是数据分析和挖掘在教学中的应用,如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教学效果评估等。

3. 以现代化思维促进专业转型升级

专业转型升级是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财经专业进行调整和优化,以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其主要包括四个内容:一是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三是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如案例教学、模拟演练等;四是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拓宽知识面和视野。

4. 以全球化思维实现专业国际化发展

国际化发展强调在全球视野下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财经人才。不仅涉及教育内容的国际化,也包括师资队伍、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等方面。其主要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资源和课程体系,提高教学水平;二是加强与国际高校和机构的合作交流,开展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三是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四是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国际化素养和教学能力。

5. 以实践导向深化产学研融合

实践教学和产学研合作强调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它要求通过与企业 and 行业的紧密合作,提供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指导。其主要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二是与企业 and 行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项目,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和问题;三是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and 创新创业活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四是增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以促进学生顺利实现就业和职业发展。

注 释:

- ① 分别为: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对外贸易经济、财政与信贷、会计学 and 统计学。
② 分别为: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金融、统计学、会计学、对外贸易经济、世界经济、经济地理。

参考文献:

- [1] 吴玉伦.近代商业教育在清末的兴起[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30-34.
[2]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三十九[Z].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59.
[3] 门振华.职业技术教育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53.
[4] 刘秀生.中国近代中初级商业专门教育[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2):52-56.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 第三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9:84.
[6] 《中华教育改革编年史》编写组.中华教育改革编年史2[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2009:621.
[7]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23.
[8]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96.
[9] 王越,周德昌.中国近代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49.
[10]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4.
[11] 记孙中山先生政见演说会[N].民国日报,1916-07-18.
[12]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12-113.
[13]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07.
[14] 娄立志,广少奎.中国教育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93.
[15]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1906—1996)[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76.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3.
[17] 郎宏文,武莉.经济学、工商管理类本科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J].科技与管理,2006(7):134-136+139.
[18] 许康.中国管理科学化的历程[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38.
[19] MARSHALL, L.C.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3(21):97-110.
[20] 付宏,戴化勇.“新财经”背景下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N].中国教育报,2024-04-16(11).
[21] 赵锋,陶珍生.以“新财经”改革助推专业迭代升级发展[N].中国教育报,2024-04-16(11).
[22]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2021-04-20(001).
[23] 余其平,吴钟.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财经类高校跨学科科研合作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3(6):116-125.
[24] 蓝媛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大数据赋能路径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4(1):120-125.

(责任编辑:陈 昀)